

城乡差别对中国居民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

——以家务劳动时间为例

张锦华 胡军辉

【摘要】家务劳动时间配置决策是家庭时间配置的重要内容,文章构建了影响城乡居民家务时间配置的理论及实证方程,并利用 Oaxaca-Blinder 技术对城乡差别在家庭内部生产中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探索 and 比较。研究表明,城乡差别对于居民家务时间的配置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对年龄、市场工资水平、家庭规模和闲暇等有显著的调整,最终导致农村家庭男女劳动者的日均家务劳动投入时间少于城镇家庭。从福利效应来看,农村家庭生存和生存补偿的压力大,家务劳动尤其是重叠性劳动的工作强度有损于妇女的健康福利,并有碍于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家庭资源支配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丧失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关键词】城乡差别 家务时间 内部分工 Oaxaca-Blinder 分解

【作者】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军辉 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副教授。

家务劳动是指劳动者生产或提供由其家庭成员直接消费或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家务劳动时间则是该项家庭内部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要害投入,显然家务时间的配置决策是劳动者个体特征与家庭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典型的转型经济体,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中尚未真正完全消除体制上的二元性,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乡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配置决策,如齐心、田翠琴(2003)的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农村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服务水平的限制,农民的家务劳动负担更重,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多于城市居民,而王亚林(1991)对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研究表明,随着城镇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服务业网点增多、居民日常生活日益便捷、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事业的发展 and 居民住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2 年青年项目“要素歧视、经济溢出与可持续增长”(71203129)的阶段性成果。

房条件的改善等,中国城镇职工已大大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并降低了劳动的强度。但上述研究还仅仅停留于城乡家庭家务时间配置差异的描述性层面,对于城乡差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居民家庭家务时间的配置决策和相应的影响机制问题,未在理论和经验上给出有效的回答。更为重要的是,时间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家务时间的配置决策将直接影响家庭及其成员的福利水平,因此研究劳动者家务时间的投入水平,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鉴于男女劳动者在市场工作和家庭内部生产中客观存在的生产效率差异,家庭内部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的构建和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在理论上来解释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决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经验调查数据进一步分解城乡差别对中国居民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程度,为制定和实施城乡统筹的福利均等化政策和措施,提供一个微观基础。

一、分析框架

(一) 基本模型

一个两人家庭模型很容易被推广到多人家庭,仅考虑1个各自有着独立偏好的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共同消费家庭生产产品,在实证中可以通过家庭规模再进行拓展。假定双方的市场工作时间既定,则其直接效用函数可设为:

$$U^i = U^i(Z, t^i) \quad i=m, f \quad (1)$$

其中, U 为直接效用函数, m 为男性, f 为女性, t^i 为闲暇, Z 为最终可供家庭消费的家庭生产产品向量,它按家庭生产函数 Z 方式生产,设家庭生产函数为:

$$Z = Z(x, t_h^m, t_h^f, E) \quad (2)$$

式(2)中 t_h^m 和 t_h^f 分别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生产中提供的家务时间, E 为代表家庭能力、人力资本、社会和自然状态和其他影响家庭生产的变量集合,既包含决定家庭内部生产效率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又包含外部环境变量; x 为家庭可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向量,作为家庭内部生产的投入品;只简单地考虑一期情形,也就是假定家庭当期收入全部用于消费支出,没有储蓄、非劳动收入,也不存在金融借贷行为,则:

$$p_x x = w^m t_w^m + w^f t_w^f \quad (3)$$

其中, p_x 为市场商品 x 相应的价格向量, w^m 和 w^f 分别为夫妻各自的市场工作工资率,相应的市场工作时间分别为 t_w^m 和 t_w^f ,在短期内,在此假定其为无弹性的固定值,工资率和物价水平均可认为是常数,因此由式(3)决定的家庭市场商品购买量和结构也将保持不变,尤其是在短期内家庭偏好稳定的情形下。时间总量作为一种重要而稀缺的资源,对于夫妻双方而言,可支配部分无疑有一个上限,比如一天24小时,因此可设个人可支配时间总量为 t ,并按照 Gronau(1980)时间三分法,有:

$$t_w^i + t_h^i + t^i = t \quad i = m, f \quad (4)$$

根据式(1)至式(4)并给定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则一个理性人内在的配置决策条件必然是: $MU_z^i / MU_{t^i}^i = Z_{t^i}^i, i = m, f$;即商品和闲暇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家务劳动的生产率。以图表

示,图中纵轴表示商品,横轴代表时间,其中市场工作时间以 t 为原点,从右向左表示,闲暇以 0 点为原点从左向右表示,在无弹性假定下,市场工作时间固定为 t_w^i ,个人可支配时间总量为 $0t$;家务劳动时间则以 t_w^i 为原点从右向左表示; $U^i(Z, t_i^i)$ 代表商品—闲暇的无差异曲线,而家庭生产函数为 $Z(x, t_h^m, t_h^f; E)$,假定 $Z_h^i > 0, Z_h^i < 0$,也就是说由于疲劳和投入比例变动及家庭生产内容的不同,致使其边际生产率递减,是一条下凹的曲线,在给定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的前提下, $U^i(Z, t_i^i)$ 与 $Z(x, t_h^m, t_h^f; E)$ 相切于 K 点,即理性人内部决策的均衡点,由此确定了闲暇时间为 $0t_h^*$,而家务劳动时间为 $t_w^i t_h^*$,此时的家庭生产最优产出量为 Z^* , $Z^* = Z(x, t_h^{m*}, t_h^{f*}; 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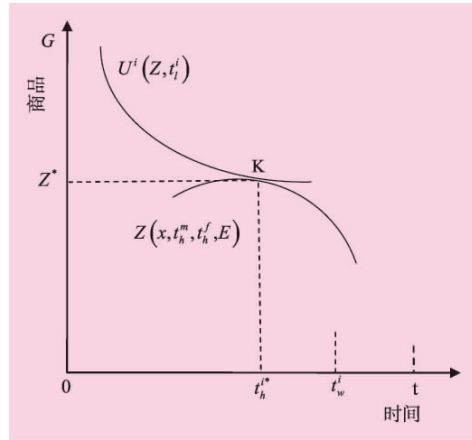


图 个人时间配置决策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各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决策方程:

$$t_h^i = F(MU_z^i / MU_{t_i^i}^i, Z_h^i, t_h^k, t_i^i, E) \quad i=m, f; k=f, m; k \neq i \quad (5)$$

F 为函数表达式,有了可交易的家务劳动市场以后,家务劳动产品的市场定价为边际商品—闲暇替代率 $MU_z^i / MU_{t_i^i}^i$ 提供了可以量化参照的依据,即家务劳动的市场工资率。配偶在家庭生产中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 t_h^k 除了由各自在家庭生产中的效率 Z_h^i 所决定外,夫妻双方在家内部分工中所处的“谈判地位”或称之为“议价能力”将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丈夫与妻子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自的议价能力,即影响对方的家务劳动时间,可以作为对方家务时间的代理变量。

(二) 城乡差别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各种影响因素的数量变化如何影响时间配置相对量的变化,为了简化方程,设定 F 为半对数函数形式,设 X^i 表示式(5)影响家务劳动时间配置决策的各个变量的线性组合。则家庭家务时间配置的样本估计方程为:

$$\ln t_h^i = \beta_0 + \beta^i X^i + \mu^i \quad i=m, f \quad (6)$$

其中 β_0 为模型中的截距项, X 则表示样本所有影响其家务劳动时间配置因素的向量集合, β 为待估诸因素的向量集合所对应的各回归系数的向量集合, μ 为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并假定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则当各因素的向量集合分别取其均值时,随机误差项的期望值为零。

家务劳动时间在城乡家庭中的配置总差异,一部分可以由影响家庭内部分工和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特征因素来解释,如家务市场的工资水平、家庭的生产效率、议价能力(收入贡献)、家庭的消费观念及家庭状况和传统文化的地区性差异等因素;另一部分是由于目前的城乡差距导致的如城乡间的收入、公共服务设施、社会福利保障程度和性别平等意识等差别,因此要借助于 Oaxaca-Blinder 方法来分解这部分差异。为了揭示城乡差别对城乡家庭

内部分工和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效应,首先以 U 和 R 分别代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以 m 、 f 分别表示男、女劳动者,假设其家务时间配置由下式决定:

$$\ln t_{hj}^i = \beta_{0j}^i + \beta_j^i \ln X_j^i + \mu_j^i \quad i=m, f; j=U, R \quad (7)$$

在 Oaxaca-Blinder 分解中,需要指定一个参照基准,可以用城镇家庭作为参照基准,也可以用农村家庭作为参照基准,选择不同的参照基准其分解结果会有所不同。本文选择以城镇家庭作为参照基准,主要是考虑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并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选择城镇家庭为参照基准,可以用来逼近和测度农村家庭与城镇家庭(即参照基准)之间的距离和进度。这样,城乡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的均值差距就可以分解为:

$$\ln \bar{t}_{hr}^i - \ln \bar{t}_{hu}^i = (\bar{X}_{hr}^i - \bar{X}_{hu}^i) \beta_U^i + (\beta_{0r}^i - \beta_{0u}^i) + (\beta_r^i - \beta_U^i) \bar{X}_R^i \quad i=m, f \quad (8)$$

其中, $\ln \bar{t}_{hr}^i - \ln \bar{t}_{hu}^i$ 为城乡家庭劳动者所投入的均值家务劳动时间(取自然对数后)的总差异,而等式右边第一项 $(\bar{X}_{hr}^i - \bar{X}_{hu}^i) \beta_U^i$ 表示的是城乡劳动者由于个人、家庭及家庭外部环境等特征因素均值所引起的可解释的家务时间配置差异,等式右边第二项 $(\beta_{0r}^i - \beta_{0u}^i)$ 和第三项 $(\beta_r^i - \beta_U^i) \bar{X}_R^i$ 则表示去除上述可解释的差异后的剩余差异部分,也就是说是由于难以度量的城乡差别所导致的城乡家庭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的差异部分。

要分解出上述差异,必须获得式(6)中各特征变量的参数估计值。Oaxaca-Blinder 分解的基本假定是经典线性回归(OLS),因此,首先需要按照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步骤求解各特征变量的系数估计值,OLS 实证模型为:

$$\begin{aligned} \ln t_{hi}^i = & \beta_0 + \beta_1(wage) + \beta_2(age) + \beta_3(sqage) + \beta_4(educ10) \\ & + \beta_5(incshare) + \beta_6(hhsize) + \beta_7(sqhhsize) + \beta_8(employed) \\ & + \beta_9(\ln leisur) + \beta_{10}(south) + \mu_j^i \end{aligned} \quad (9)$$

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家务劳动的工资率,选取当地的平均小时工资水平($wage$)作为替代指标。选取了年龄(age)、教育程度($educ$)、闲暇时间的对数($\ln leisur$),用来表示被调查者对商品—闲暇的偏好程度和家务劳动生产率,同时用年龄的平方($sqage$)来捕捉非线性效应,而受教育程度以是否超过 10 年($educ10$)作为工具变量,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回避多重共线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年龄、是否失业等变量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incshare$)和现在是否就业($employed$)两个变量用来表示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状况,在市场工作完全弹性的前提下,个人收入显然是其从事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而失业的成人在家务劳动机会成本方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配偶工作时间实际取决于个人收入的贡献和其他影响议价能力的因素,为了避免重复而没有放入实证方程中。以家庭人口规模($hhsize$)及其平方项($sqhhsize$)来衡量家务劳动的规模效应,而调查者是否处于南方地区($south$)则用来表示社会传统文化对家务劳动配置的影响,毕竟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区,人们关于性别意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可能存在较大的

差别,可用以表示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家务分工的影响。

二、家务时间配置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该调查提供了大量的城乡成年劳动力和儿童个人的人口学特征、职业、收入、时间配置和家庭层次的生产、收入、消费等详细信息,可以用来研究家庭和个人时间配置问题。本文以其中的18~60岁的已婚成年城乡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共得到1342个城镇女性、1606个农村女性、969个农村男性和1417个城镇男性样本,其中城镇与农村的划分以户籍为依据。

根据数据的可获性,本研究中的家务劳动包括劳动者为家庭购买食品、做饭、洗熨衣服和打扫房间等家务活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绝对值上,还是在家庭内部的配置比例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劳动者配置家务劳动时间的绝对值来看,城镇家庭的女性劳动者和男性劳动者投入的家务时间都要多于农村家庭的劳动者,分别要多出11.57分钟/天和22.14分钟/天,因而在家庭总家务时间投入上,城镇家庭要比农村家庭多33.71分钟/天(见表1)。城镇家庭女性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多于农村女性,城镇家庭男性投入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间的自然对数值也要大于农村男性,由于因变量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取自然对数值,尽管两者差额很小,但仍表示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每天的生产生活之中。

从家庭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性别结构上来看,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女性投入家务劳动时间都多于男性,从而使女性和男性在各自家庭中所占的家务劳动时间比例分别为66.12%、33.88%和70.69%、29.31%,因此,城乡家庭内部均存在比较严重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不平等的情形。而且这种不平等程度在农村家庭中比城镇家庭更为不平衡,农村家庭女性劳动者比男性劳动者多投入41.38个百分点,而城镇家庭女性劳动者只比男性劳动者多投入32.24个百分点。

从个人的特征、家庭及家庭外部环境来看,解释变量中城镇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农村女性,表明城乡间存在着较大的教育水平差距,而且城镇家庭女性劳动者的闲暇也要比农村家庭女性劳动者更多;在家庭规模上,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平均多0.7人;令人费解的是,城镇家庭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就业比例比农村家庭女性劳动者低16个百分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城镇女

表1 城乡家庭家务时间配置比较

	城镇家庭		农村家庭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家务劳动时间均值(分钟/天)	177.49	90.95	165.92	68.81
城、乡家庭家务时间差距(分钟/天)	11.57	22.14		
女性比男性增加配置的比例	86.54		97.11	
劳动者占家庭家务时间比例(%)	66.12	33.88	70.69	29.31
男女劳动者的比例差距	32.24		41.38	
城乡家庭家务比例差距	-4.57	4.57		

性的家庭收入较高,可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城镇家庭的男性劳动者在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贡献、闲暇时间方面均要大于农村家庭男性劳动者;与前述相同的原因,在家庭规模和平均就业水平方面,农村家庭均高于城镇家庭。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女 性				男 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家务劳动时间对数	5.07	5.02	0.47	0.45	4.34	4.09	0.51	0.58
市场工资率	7.82	2.75	0.78	0.56	6.29	2.21	0.81	0.45
年龄	44.54	43.74	10.95	10.81	44.56	42.65	10.97	10.80
年龄的平方	2103.21	2030.05	927.14	907.49	2106.02	1935.74	923.25	894.36
受教育年限 10 年以上	0.44	0.10	0.50	0.30	0.58	0.16	0.49	0.37
个人收入占家庭的比例	0.29	0.29	0.27	0.47	0.41	0.35	0.35	0.51
家庭总人口数	3.49	4.19	1.27	1.66	3.46	4.11	1.28	1.59
家庭总人口数的平方	13.79	20.29	11.21	17.21	13.63	19.45	10.86	15.92
就业与否	0.52	0.68	0.50	0.47	0.73	0.86	0.44	0.34
闲暇时间对数	8.43	8.36	0.26	0.26	8.48	8.38	0.29	0.26
南方地区	0.56	0.54	0.50	0.50	0.55	0.54	0.50	0.50
样本量	1342	1606	1342	1606	969	1417	969	1417

(二) OLS 回归结果

1. 家务劳动的隐性和显性成本的影响

O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市场工资水平、劳动者的工作状况、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反映了家务劳动的各种隐性和显性成本,但对于城乡家庭来说,其影响是有差别的。市场工资水平反映了劳动者从事家务劳动的隐性成本,从回归结果来看,市场工资水平对农村女性来说并不显著,却对农村男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工资越高,农村男性劳动者减少家务时间的比例越大,这与城镇家庭完全相反,其原因可能与城乡不同的就业结构有关,男性仍是农村家庭的就业主体和主要收入来源,因而受市场工资影响更大,而城市家庭就业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作为更直观的成本体现,劳动者就业状况十分显著地影响着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无论是男性劳动者还是女性劳动者,在职的劳动者所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均明显少于失业或在家待业的劳动者。此外,受教育程度反映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在城乡家庭内部的效应也有较大的差别,高中及以上的男性劳动者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多于高中以下的劳动者,但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村女性劳动者具有负效应且呈微弱的显著性,而对于城镇女性劳动者并不显著。与齐心、田翠琴(2003)的研究不同的是,从家庭角度看,如果排除样本选择的问题,这似乎颠覆了家务劳动“劣等品”的经济学性质,反映了其复杂性,事实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家务劳动的广度和深度也在发生改变。

表 3 家务时间配置的 OLS 回归结果

	女 性		男 性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截距	4.3322** (10.111)	3.9988*** (8.210)	3.8343** (6.848)	3.1114*** (4.704)
市场工资率	0.0344 (0.756)	0.1309*** (2.987)	-0.1031* (-1.863)	0.0190 (0.309)
年龄	0.0227** (2.622)	0.0128 (1.272)	0.0241** (2.102)	-0.0006 (-0.042)
年龄的平方	-0.0002* (-2.171)	-0.0001 (-0.753)	-0.0003 (-1.953)	0.0001 (0.328)
受教育年限 10 年以上	-0.0401* (-1.932)	0.0144 (0.529)	0.0218* (1.903)	0.0156** (2.444)
个人收入占家庭的比例	0.0114 (0.457)	0.0026 (0.049)	0.0076 (0.236)	-0.0087 (-0.155)
家庭总人口数	0.0324 (1.204)	0.0782** (2.005)	0.0239 (0.571)	-0.0257 (-0.431)
家庭总人口数的平方	-0.0040 (-1.572)	-0.0095** (-2.196)	-0.0051 (-1.247)	0.0024 (0.360)
就业与否	-0.1810*** (-7.152)	-0.2208*** (-7.104)	-0.2661*** (-5.579)	-0.2653*** (-6.012)
闲暇时间对数	0.0267 (0.590)	0.0731 (1.472)	0.0065 (1.916)	0.1667** (2.515)
南方地区	-0.0778*** (-3.344)	-0.1268*** (-4.916)	-0.0125 (-0.380)	0.0135 (0.391)
样本量	1606	1342	1417	969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字为 t 值。

2. 城乡家庭个体特征的影响

个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贡献对于劳动者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当前中国家庭的社会分工结构仍具有稳定的传统特征，男女的性别分工仍有重要影响。同时，家庭规模只对城镇女性劳动者有显著影响(0.0782)，且家庭规模的扩大具有规模经济性(-0.0095)。闲暇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存在替代性，尤其是对于男性劳动者更为明显；女性劳动者显然对于地区性因素更为敏感，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的女性劳动者家务时间投入比北方地区的更少，而城乡男性劳动者家务劳动时间的地区差异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年龄因素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无论是女性劳动者还是男性劳动者都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明显增加家务劳动时间，但增加的速度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缓，但这一效应同样在城镇家庭的劳动者中不显著。

三、城乡差别影响家庭家务时间配置效应的比较

(一) 城乡差别影响劳动者配置家务时间的效应差异

1. 城乡家务时间配置差异的来源

由表 3 中 OLS 回归得到的各解释变量系数值，结合各解释变量的均值，以城镇家庭作为参照标准，可以用来计算引起城乡家庭女性劳动者日均家务劳动时间自然对数值条件均值差异的结构性分布状况，其 Oaxaca-Blinder 分解的结果列在表 4 中。表 4 表明，城乡家庭女性劳动者日均家务劳动时间自然对数值条件均值差异为 -0.0582，其中有 82.74%(-0.0482)是由可解释的市场工资、年龄、教育、家庭规模等个体及家庭特征差异所引起，不可解释的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差异比例为 17.26%。而城乡家庭男性劳动者日均家务劳动时间自然对

数值条件均值差异为 -0.2966 ,其中有 22.57%(- 0.0669)是由可解释的特征差异所引起 ,不可解释的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差异比例为 77.43%。

表 4 城乡男、女家务时间配置的 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男 性				女 性			
	$(\overline{X}_k^r - \overline{X}_k^l)$	占总差异	$(\beta_{or}^l - \beta_{or}^r)$ 和	占总差异	$(\overline{X}_k^r - \overline{X}_k^l)$	占总差异	$(\beta_{or}^l - \beta_{or}^r)$ 和	占总差异
	β_{or}^l	百分比	$(\beta_{or}^l - \beta_{or}^r)\overline{X}_k^r$	百分比	β_{or}^l	百分比	$(\beta_{or}^l - \beta_{or}^r)\overline{X}_k^r$	百分比
截距			0.7229	- 243.74			0.3334	- 572.89
市场工资率	0.0004	- 0.13	- 0.1051	35.42	0.0052	- 8.10	- 0.0878	150.84
年龄	0.0011	- 0.36	1.0502	- 354.07	- 0.0102	17.54	0.4332	- 744.41
年龄的平方	- 0.0085	2.87	- 0.6040	203.62	0.0064	- 11.06	- 0.2700	463.91
受教育年限 10 年以上	- 0.0066	2.22	0.0010	- 0.33	- 0.0049	8.39	- 0.0054	9.35
个人收入占家庭的比例	0.0005	- 0.18	0.0057	- 1.92	- 0.0000	0.00	0.0026	- 4.43
家庭总人口数	- 0.0167	5.64	0.2038	- 68.73	0.0547	- 94.02	- 0.1919	329.74
家庭总人口数的平方	0.0142	- 4.80	- 0.1469	49.54	- 0.0616	105.76	0.1102	- 189.34
就业与否	- 0.0345	11.63	- 0.0007	0.23	- 0.0353	60.69	0.0270	- 46.47
闲暇时间对数	- 0.0167	5.62	- 1.3427	452.68	- 0.0051	8.79	- 0.3878	666.39
南方地区	- 0.0001	0.05	- 0.0140	4.72	0.0025	- 4.36	0.0265	- 45.46
合计	- 0.0669	22.57	- 0.2297	77.43	- 0.0482	82.74	- 0.0100	17.26

不可解释的城乡差别对于劳动者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净影响又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一是式(8)中未能被解释的平均差异 ,也就是由城乡差别所造成的截距项差距(直接效应) ;二是城乡差别通过调整式(8)中各解释变量的效应结构所形成的差异(间接效应)。对女性劳动者来说 ,模型中未能解释的平均差异值为 0.3334 ,占日均家务时间配置自然对数值的条件均值差异 - 0.0582 的 - 572.89% ,接近总差异的 6 倍左右。对男性劳动者来说 ,城乡差别所造成的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平均差异值为 0.7229 ,约占全部总差异的 - 243.75%。也就是说 ,城乡差别直接引起农村劳动者比城镇家庭劳动者更多地配置了家务时间 ,而且该效应值是全部净差异的数倍。因此 ,城乡差别中的未被解释的因素(如城乡社会福利差距、生活环境差异、公共服务设施差别、家庭内部生产的范围和深度差异等)是造成此效应的重要原因。

2. 城乡差别对特征者效应的结构性调整

城乡差别对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特征值效应的结构性调整是十分突出的 ,对女性和男性年龄特征值效应的调整为 0.4332 和 1.0502 ,对年龄平方项效应的调整为 - 0.2700 和 - 0.6040 ,也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村劳动者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递增 ,但投入增长的趋势递减 ,而男性则下降更快。这说明农村家庭的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从事家务劳动的波动性比城镇家庭女性劳动者更大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更加不均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家务劳动的增量部分主要是由女性劳动者承担。但另一方面 ,城乡差别对于市场工资水平、家庭规模、闲暇对家务时间的替代弹性等的调整效应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比城镇减少配置了家务劳动时间 ,而且这种调整效应超过了前面的增加效应幅度 ,

从而使总体上农村劳动力比城镇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更少一些。这表明,农村家庭的生存压力更大,因而更在乎市场工作时间,同时体力消耗的增加又使他们对闲暇的偏好增加,特别是对农村男性劳动者来说,闲暇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的替代弹性值达到-1.3427,是全部总差异值的4.5倍(452.68%),显示出其具有更大的边际闲暇需求。加上成婚以后通常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可以相对节约家务时间,从而使家务劳动时间配置有所减少。

(二) 福利分析

由于二元性的经济社会特征尚未完全消除,在社会福利制度、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在城乡间仍存在巨大差距,即使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背景下,依然在就业、医疗、教育、福利保障等方面面临不公平待遇。面对城乡有别的家庭外部环境及其变迁,必然促使城乡家庭相应地调整家务分工和时间配置,从而产生家务劳动调整的福利效应。农村家庭的成年劳动者均比城镇家庭成年劳动者所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绝对值更少,其可能的原因是职业分割、福利和收入的差距,迫使农村家庭及其成员只能通过增加外部劳动时间来配置其可支配时间,特别是在面临家庭收入的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威胁到生存的境况下,因而相应减少了家务时间配置。但在家庭内部分工结构上,农村女性劳动者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要比城镇女性劳动者高,是由于城镇家庭成员比农村家庭通常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平等的意识更为强烈而使家庭内部的分工更趋于平衡,因为城乡差别加剧了农村家庭内部家务分工的不均等。

从效用角度上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生产规模和劳动强度不变的前提下,家务劳动时间可以作为度量福利水平的工具或手段之一。与市场工作时间一样,在经济学意义上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劣质品,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负效应直接表现为挤出闲暇这种“正常品”的消费量。而且家务劳动时间与其工资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为市场工资直接或间接地受投入到市场工作中的时间等因素的影响(Hersch等,1994)。但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劳动者的家务时间配置更为灵活,家庭内部生产的范围更大,家务劳动的质量要求也更高,而农村家庭劳动者受制于收入、职业变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因素,外部环境的变迁对其投入家务劳动时间的冲击更大,家庭生产调整更不稳定,使农村家庭男女劳动者的日均家务劳动投入时间绝对值均要少于城镇家庭,从而更少提供家庭产品,减少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整体的福利水平。

从家庭内部分工角度上看,由于家务劳动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家庭内部具有公共品属性,而家务劳动又是一项典型的不计酬活动,因此,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状况直接关系到家庭成员特别是男女劳动者分工中的性别平等和福利均等问题。农村妇女过多地从事家务劳动无疑将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劳动者个人的福利水平和市场工作的竞争能力,导致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Chiappari等,2009),从而反过来使自己在将来的市场竞争和家庭资源支配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同时,长期从事重叠性家务劳动时,必然会阻碍家务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妇女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家务劳动所具有的封闭性特征进一步弱化了她们与外部市场

和社会的联系。更为严重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务劳动者,其在从事家庭生产活动中人力资本的折旧率将会更高,并在事实上显然极大地限制了其就业选择的空间和范围。

四、基本结论

本文以家务劳动时间为例,构建了影响城乡居民时间配置的理论及实证方程,并利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技术对城乡家庭劳动者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差异所进行的分解,对城乡差别在家庭内部生产中影响效应进行了探索 and 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劳动者,城乡差别对于其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都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平均家务时间配置和对特征因素效应进行结构性调整两个方面分别发挥作用,并最终导致农村家庭男女劳动者的日均家务劳动投入时间绝对值均要少于城镇家庭。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劳动者,城乡差别对于个体和家庭特征因素效应的结构性调整(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年龄、市场工资水平、家庭规模和闲暇 4 个方面,但从调整方向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农村家庭劳动者的年龄均使其相对于城镇家庭增加了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而市场工资水平和闲暇均使其相对于城镇家庭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配置。此外,家庭规模对于农村家庭的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存在截然相反的结构性调整效应,家庭规模的扩大使农村男性劳动者相对于城镇家庭更多地投入了家务劳动,而使农村女性劳动者相对于城镇家庭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

从福利效应来看,农村家庭劳动者受制于收入、职业稳定性和其他城乡差别因素,家庭生存和生存补偿的压力更大,从而使农村家庭男女劳动者的日均家务劳动投入时间绝对值均要少于城镇家庭,从而更少提供家庭产品,减少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整体的福利水平。在城乡差别通过劳动者特征因素产生的结构性调整效应上,对农村女性劳动者的相对影响程度要大于男性。家务劳动尤其是重叠性劳动的工作强度有损于妇女的健康福利,并有碍于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家庭资源支配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丧失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参考文献:

1. 齐心、田翠琴(2003)《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2. 王亚林(1991)《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3. 张玉林(2003)《分级办学制度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城乡教育差距:关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4. Pierre-Andre Chiappori, Murat Iyigun, Yoram Weiss(2009) Investment in Schooling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5):1689-1713.
5. Joni Hersch and Leslie S. Stratton(1994) House Work, Wag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Time for Employed Spous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120-125.
6. Reuben Gronau(1980) Home Production- A Forgotten Industr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2(3):408-416.

(责任编辑:朱犁)

make differentiated urbanization policies for different regions.

China's Public Services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ai Xiuyun and Others · 58·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s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public services are lagging behind in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caused by not only the gap between the public service demand and supply under the urbanization but also public finance expenses gap on the services' development. This inconsistency poses an obstacle to China's fast-develop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u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more citizens' sharing economical success, increasing the public finance expenses on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especially in the term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factor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For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the estimated growth rate of necessary annual public finance expenses for the future needs.

The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ir Sharing of the Success

Yang Xiaojun · 66·

Migrant workers, moving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cities and towns, have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On constructing the new labor allocation model under the Chinese three-sector economic structure, we investigate the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ir sharing of the gains from 1985 to 2009.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migrant worker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ir sharing of economic success tends to be lower; both the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ir gains sharing have clearly shown phased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mainly on their quantity rather than their labor productivity; success sharing of migrant workers to economic growth has presented a reduction trend as a whole.

The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Upward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Fu Ping and Others · 75·

Based on the data of a national survey,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outcome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show that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migrant workers have an occupation with little physical labor required. Furthermore, the occup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eneration differences. Huma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m to acquire jobs at higher end. Social capital is proved to be helpful for them only to get lower level jobs, and political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at all. The study shows that despite the upward mobility obstacles the female and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richer urban work experience have better prospects of promotion in their occupation.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on Chinese Household Time Allocation

Zhang Jinhua Hu Junhui · 83·

The time planning of house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usehold time alloc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quations for the effects of the housework's time allocation, and with the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it makes both comparison and analyses on the impact of urban and rural gaps on household time allo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aps influence the housework's time allocation from two aspects, which are the direct effect by the allocation of average housework time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characteristic factors. Due to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l adjustment of the age, the level of market wage, the household scale and the leisure time,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daily average housework time in the rural households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urban households. In terms of the welfare effect, the rural work intensity of housework, especially the overlapping work, is harmful to women's health welfare and hinders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refore, it will lose more options due to the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domin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Rural Migrant Workers

Weng Jie · 93·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rate in government-funded train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employed by manufacturing firms in Hangzho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Wi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overnment-funded training and private train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government-funded training and that of private training are around 10% each, and comparing to private training, the government-funded training has less training hours and smaller funding mone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funded training has little improvement on the skill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rovides little increase on income level as well. In contrast, private training actually has maintained as one effici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lternative. In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obvious problems such as low actual training coverage, less training input and bad training practicability 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funded training system.